

# 论杨义《京派海派综论》的研究方法

丁璇<sup>1\*</sup>

(<sup>1\*</sup>长沙理工大学 文新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杨义先生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深入研究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思路。具体而言, 杨义的京派海派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三大特点: 一是现象还原, 通过史料的严谨考证, 透过时代观念的遮蔽, 致力于还原文学现象的历史本真; 二是个案分析, 多维度的剖析京派海派的文化因缘, 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化碰撞中的缩影; 三是大文学观的考察视角, 将文学放置于宏观的文化史之中, 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深度。杨义的京派海派研究不仅体现了他扎实的史料功底与开放的学术视野, 也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深化。

**关键词:** 京派; 海派; 史料; 现象还原; 大文学观

## O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Yang Yi's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Ding Xuan<sup>1\*</sup>

(<sup>1\*</sup>Wenxin Colleg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Mr. Yang Yi's in-depth study of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has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and depth for future researchers. Specifically, Yang Yi's research on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exhibits three major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phenomenon restoration, which involves rigorous textual research and penetrating the obscurity of era concept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literary phenomena; second, case analysis, which delves int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vealing a microcos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midst cultural collisions; third, a macro-literary perspective, which places literatu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ultural history, expanding the horizon and depth of literary research. Yang Yi's research on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solid found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pen academic vision but also promotes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i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s:** Beijing School; Shanghai School; historical materials; phenomenon restoration; macro-literary view

## 引言

京派与海派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其文学色彩形成鲜明对照。自20世纪80年代起,杨义先生从比较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城市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京派与海派复杂的精神谱系,直面文学作品本身,以广阔的视角不断推进和创新,给人以通达之感。本文拟从严谨的史料论证,多元的流派分析和融合的“大文学观”三个方面对杨义京派海派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思考其研究方法为后来者提供思路的同时,是否又形成新一层的禁锢。

### 1. 严谨的史料论证

杨义强调史料的一手性,一方面体现在资料查证的严谨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强调直面文学作品,去除社会意识的遮蔽。杨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证实阶段,受到了乾嘉学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影响,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敢于以怀疑的眼光治学。他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源头进行细读分析,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原始资料,强调史料的一手性,并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结合作家所受到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文学审美的取向、文化基因的传承等,寻找作家和流派的归属关系。史料越是翔实丰富,越能清楚地了解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或影响。杨义提倡求真史观,“对于初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下一番探幽索微、勘误辨伪的工夫,而一味地在研究方法上追求新奇,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沙滩上的。”[1]如在理解凌叔华作品中透出的文人写意画趣味及“高门巨族的精魂”时,杨义从家族历史和文化基因上入手,探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文本,辨析出其父亲为进士,曾任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等。这种精细的个体辨析体现出杨义对于治学的扎实态度,正如他所提到的,“现象还原和文化定位,是我对文学流派进行研究的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是一种‘实学’”[2]。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受到政治影响极深,如凌叔华作为早期京派中颇具特色的小说家,却因为和新月派、现代评论派有所关联,而很少在五六十年的文学史著作中被提及。所以,杨义侧重于直面文学史,拨开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对于文学作品梳理的遮蔽,而重新从作品的真实意味和流派自然发展的历程出发,审视作家和流派的关系。

除了多方收集资料外,杨义还研究了许多勘误的方法,关注历史资料的“真相”。在真实性和可靠性有所保障的基础上,才能谈及研究的创造性。杨义擅长抓住文学思潮的主流,但是并不忽略支流或对立。面。“小说史才不因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恶毒的鞭尸文章而将她有意识‘遗忘’,或加以情绪性的鞭挞,而是从艺术的视点出发,于清隽可读处首肯之,于因其依附政治而艺术味荡然处惋惜之。”[4]正因为杨义对待史料的态度严谨,并重视作品的艺术特征,才有此评价。《京派海派综论》中,杨义书写了极多对于两派作家作品的理解,对各个作家所受到的流派影响也厘出了清晰的脉络线索,对文学现象作出历史还原。杨义的文化视角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开放和先进的历史观。

### 2. 多元化的流派分析

《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是杨义治《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把京派和海派作为典型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总汇。“京海之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文化间发生的激烈碰撞的缩影。”[2]杨义从地域、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双城记”。京派作家群和上海现代派的名称分源自京派和海派戏剧。京派戏剧是由官邸演出,讲究精致规范的行当家法,一般被视为正统派,海派戏剧则是大批京师艺人来到上海,受到商埠繁华的刺激而形成,戏剧演出讲究情节性和娱乐性,也因此受到京派戏剧的讥讽。正如鲁迅《“京派”与“海派”》所言:“‘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2]京派理论讲究自然和谐,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他们的审美理想倾向于美好健全的人性,言必称希腊。海派则效法法、日,他们的艺术取向倾向于机械迅速发展而喷出的人类时髦色调。京派是指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包括20年代语丝派、新月派滞留北平的作家和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新秀,如周作人、杨振声、废名、沈从文、朱光潜、凌叔华、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梁宗岱、李健吾等。海派则是多层面的文学混合体,既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现代派,也有张资平和章衣萍等侧重写两性心理的新式言情小说作家及鸳鸯蝴蝶派等。京派作品中沉浮着的是对自然人性的皈依,对虚伪荒芜的社会等级的拒斥,流淌着

对人性完善和生命重造的理想。废名从华中领略到“美在自然中”的理想，沈从文从湘西体悟到“神在生命中”的哲学。《竹林的故事》中，美好清新的三姑娘，春意盎然的溪水，绿团团的小坡，简单的讨菜对话，共同构筑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竹林，人性的美好在文章中被娓娓道来。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以第一人称吐露都市男子的微妙内心，将一个初至洋场的东方男人下意识地陷入两性吸引之中又用残存的家庭道德理念压制自己欲望的心理描写地细致入微，朦胧的雨境和半梦半醒的意识交缠，描写性心理十分圆熟。如果说京派浸染着灵秀竹子中的绿意，那海派则是散发着躁动的疯狂爵士乐。

《京派海派综述》采用图文互动的方式更鲜明地呈现出了京派与海派的差异，既使逻辑更加严密，也增添意趣。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漫画刊物对梅兰芳形象的展示，北京《立言画刊》第232期上登的是《宇宙锋》剧照，梅兰芳“妆容严整，明艳照人，俨然大家闺秀”[2]，而上海《中国漫画》第9期狂想专号登载的则是“乐而不淫”，梅兰芳“穿着比基尼载歌载舞，好像是百乐门舞厅的时髦女郎”[2]。两座不同文化大山的土地自然地孕育出不同的作品风格。图像中的元素也代表着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对文学史和图像史的双重分析，才能使图史互动，相得益彰，更体现出图志学的研究意义。

同时，杨义并不严格囿于流派的划分，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杨义认为流派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作品之中也有相互呼应之处，一个流派内的作家，其作品并非完全是流派意识的体现，正如流派是流动的，作家的意识也是流动的，不同的作品审美从另一个侧面也构成了流派的艺术张力。京派之中，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描绘了古都青年孤独、敏感的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萧乾转向海派，与海派笔下光怪陆离的洋场相比，萧乾笔下的人物仍带有东方沉静的气质，这里的性心理描写，情大于欲。萧乾的心理描写小说既使京派体现了差异融合的色彩，也表现出京派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因素。言必称法日的上海现代派之中也各有不同，刘呐鸥出之以乐天的心态，施蛰存侧重心理分析的目光，穆时英则怀有危机的心态和死亡的意识。但施蛰存的作品也存有对于乡土人生的眷恋，刘呐鸥所展现出的洋场人生样式较之施蛰存的描绘更为扭曲迷离。如《礼仪与卫生》中妻子为了让丈夫保持卫生时有人陪伴，便让自己的妹妹来陪伴丈夫，小说人物更显示出一种被外来文化价值观冲击浸染后高傲自得的态度。

### 3. 融合的“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的方法并非杨义首创，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学、文化学、图志学问题，都隶属或者近于其大文学观，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观尤为值得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提倡“杂文学观”，“孔门四科”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当时文学多理解为文献经典，文学性和史学性杂糅一处。二十世纪则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杨义要求在兼容“杂文学观”和“纯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大文学观”，以开放的眼光考察各界的相互交织。杨义对于京派海派的研究已经体现了其“大文学观”的实践，将文与史结合起来，打开新的视角。杨义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的编撰还在于文学史的创新，那么《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就是在文学史的基础上，把眼光放得更为广阔，目光所及已经不再限于文学史，而是关注到整个文化史。我一向提倡‘大文学观’或‘大文化观’，这也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的尝试。”[2]这与杨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的态度一致，他认为学科之间应该打破相对封闭的状态，而尝试各学科方法的移植借用，用新锐的眼光和态度开发出原先被忽略的区域，使广大研究者在感悟中产生新的契机，更深层次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如文史互相取法，将文学的关怀和历史的凝重结合，使文学研究更深入。

杨义以大文学观在探讨京派与海派的文化根源时，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是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作为帝都的北京和通商口岸的上海，这两座城市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文化基因。例如，从陶渊明到李商隐，再到公安派，京派作家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精神体系，同时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了古希腊神话，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以及俄国的屠格涅夫等外来文化，从中汲取与自身个性相契合的元素。而海派则主要受到日本新感觉派、法国现代派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其次是发展历程的视角，京派与海派并非静止不变，其内部结构和审美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流动。例如，沈从文除了与废名相似的安宁平静的风格，还热衷于从边远地区探索初民文化的神秘与粗犷，比起废名作品中狭窄的境界更显宽阔。海派由哀感顽艳的鸳鸯蝴蝶派演变为追寻新感觉派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上海现代派，再到各具特色、承接现

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张资平和章衣萍的媚俗文学作品也是海派文学存在的一个侧面。京派之中周作人重史、朱光潜重论的理论异同，《梦之谷》和《心病》对于心理描写的探索，以及在一九三七年之后又形成了以巴金为核心的准作家群体等，都表现出京派、海派内部的不同风貌。三是比较文化学的视角，文学流派的异同性也恰说明其多元化，如京派与海派在色彩美学上的分野：沈从文笔下的色彩世界虽斑斓多姿，却以沉静的翠绿色为精神底色；而上海现代派则热衷于捕捉都市霓虹中酒绿灯红、变幻莫测的流光溢彩。再如京派发展速度平缓，海派发展历程急速等。

由于纯粹文学的过度净化以及一些人为的阉割，文学和整个文化的关联有所割裂。因此，将文学与文化社会结合起来，展示文学的巨大创造性融合，从而产生文化生活的完整性。大文学不能仅以文学来概括，而是一种以世界和文化为导向的文学。

#### 4. 结语

无论是从多维度的历史、文化、地域或图志学角度，还是“大文学观”的方法论，都揭示了杨义广泛的学术文化视野、严谨的研究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创造力，这表明杨义没有盲目遵循他人的研究视角，而建构出一套自己的文学流派研究方法，其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眼光为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诸多思路。杨义对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阐释及其严谨的治学作风，也为后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范本，对学界中存在的先理论后文本的研究方式作了警示。同时，图文互动的研究方法虽有独到创新之处，但也为图文研究缚上了一道新枷锁，无关的图文之间是否会被强行架起联系，这一问题在部分学者论文中已稍显端倪，值得深思。

#### 参考文献：

- [1] 杨义.研究方法上的三个境界[J].文学评论,1984(6):12-16.
- [2]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沈从文.沫沫集·论冯文炳[M].上海:大东书局,1934.
- [4] 秦弓.文学史家杨义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5(4):263-270.
- [5] 梁竞男.杨义先生对京派海派的研究[J].文艺争鸣,2008(5):59-62.
- [6] 杨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 [7]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 [8] 黄科安.杨义的文学研究及其特色[J].文艺争鸣,2007(9):108-118.

(栏目主编：侯本塔 编辑：佟彤 校对：金宇恒)